

远去的星光

——胡玉缙先生的生平、学术和遗稿

李庆

1936年，胡玉缙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北京，南迁苏州，在苏州光福的镇虎山桥安居。他拥书著述，闭门谢客，专心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的撰述。他深感此事即使有“五百年之寿命，亦不能尽”。只想“得寸则寸，得尺则尺”，也就是尽力而已。

在中国学术的苍穹中，随着时光流逝，有许多渐渐远去的星光。而有一些，却会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被人重新关注。胡玉缙先生，或可以说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最近，胡玉缙先生被人关注，那是托了他在民初给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封信（见搜狐网，2018年5月8日《那人那年也因“一字”的致信：北大之魂——蔡元培的道歉信》）。为了免得读者翻查，将网上所传之事，概括叙述如下：1912年3月，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，据说是看了胡玉缙写的《孔学商榷》一文，感其才华，决定邀他到教育部任职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。

下属官员发一封信，“谕”胡玉缙来教育部任职。“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，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，本应感激不尽。”想不到胡先生不领情，回信谢绝，认为，推翻帝制，为民主国家，人皆平等。即便教育总长，与我无关，凭什么居高临下，“谕”我任职？质问：“未知从何谕起”？

面对胡玉缙的质问，蔡元培显出气度，再次请部属写信回复，接受胡先生的批评，表示歉意。道歉信一开始便承认用语不妥，认为如胡玉缙所说，“谕”字，“宜屏而弗用”，胡玉缙“立论颇正”。接着，希望胡玉缙不要介意，依然诚恳地聘请他。最后一句“本部初立，正在用人之际，若因用谕、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，殊违总长延揽之初心，字句小疵，想必通人必不芥蒂（不会在意）”。这话说得合情合理，不容你推脱了。

该文作者的本意，殆是要突出“北大校长”蔡元培的民主风度，反响颇佳。但笔者觉得该文对当时蔡、胡二者学术地位的描述，似可斟酌。民国初年，蔡元培是否为如后来所见那样的“大人物”，姑且不论；胡玉缙当时是否“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”呢？恐非如此。所以想对胡玉缙先生的生平和学术，略作一点说明，对这已经远去的星光，做一次眺望。



胡玉缙晚年留影

胡玉缙是怎样的人？当时处于何种地位？此后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，又做了些什么呢？

胡玉缙（1859年8月18日—1940年7月14日），吴县人。时年53岁，为京师大学堂教授。蔡元培，比他小9岁。辛亥革命后，回国就任教育总长。

胡玉缙19岁（1877）就入县学，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，和潘锡爵、许克勤、曹元忠、叶昌炽、王仁俊等友善。这些都是在清末江南学术界有名可查的人物。苏州正谊书院创办于嘉庆十年。同治后期，冯桂芬曾为书院山长，光绪三年，胡玉缙进此校，当曾接触到冯氏学风之余续。

后入江阴南菁书院。南菁书院是晚清著名书院之一，在江苏江阴县。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由江苏学政黄体芳所建（见顾树森《中国历代教育制度》218页，南京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

1981年），黄体芳聘请黄以周主持。黄以周（1828—1899），字元同，号傲季，又号哉生，浙江定海人。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举人，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赐内阁中书衔，十六年升教授。他主持该院讲席15年，搜集汉至清代典章制度，撰《礼书通故》一百卷，著有《子思子辑解》七卷、《军礼司马法》二卷及《傲季杂著》等（参见钱穆《清儒学案》第六十一《傲季学案》）。

胡玉缙进入南菁书院的时间当在1882年后。在学期间，经义词章俱佳，得黄以周赏识。他的才学和为人又被当时在刑部为官的许玉琢看中，以女妻之，结婚成家。许玉琢（1828—1894）又名磨庵，字起上，号鹤巢，吴县人。同治甲子（1864）举人，历官刑部郎中，与王鹏运同在刑部为官时多有酬唱之作（见《薇省同声集》），有《诗契斋诗钞》《独弦词》《诗契斋词钞》（上海图书馆藏稿本）《城南拜石词》等传世（参见徐世昌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六一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）。

光绪戊子（1888）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办学古堂（见前引顾

树森《中国历代教育制度》218页）。黄彭年（1824—1890），字子寿，号陶楼，晚号更生，清朝贵州贵筑县（今贵阳市）人。出身仕宦之家，曾为湖北、江苏布政使。“开藩吾吴，奖掖寒畯，惟恐不及”（《许廑学林》277页，又见王欣夫、徐鹏《藏书纪事诗补正》，69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。其父黄辅辰为清代循吏。子黄国瑾，亦知名。

黄彭年聘胡玉缙为斋长任教，与章钰、王仁俊等同列，被视为吴中才人的“一时之选”。是年他29岁（卢弼《许廑遗书序》，载《许廑学林》）。

在学古堂任教期间，胡玉缙对经史多有考订，如对《周易》《论语》《汉书》等（见《许廑学林》237页、107页等条目）。1890年黄彭年去世，胡玉缙为他整理遗稿，出版《陶楼文钞》，由同人集资刊出（《许廑学林》277页）。是年31岁。

光绪辛卯（1891），为江南乡试举人。后入福建学幕。为何人“福建学幕”？笔者推测，殆因当时福建学政是黄绍箕，乃南菁书院创办者黄体芳之子。胡玉缙的岳父许玉琢与王鹏运交往颇密，王鹏运和黄体芳、黄绍箕父子都是强学会中人，支持变革（见吴天任《康有为年表》1895年9月、11月条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而胡玉缙为南菁书院学生。各种社会关系的交互联络，是中国社会人事变动的重要潜在因素。

光绪庚子（1900年），胡玉缙41岁，任兴化教谕。在此期间，经历“戊戌变法”和“义和团运动”。1902年，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，改变了当初否定设立“经济特科”考试的初衷，决定第二年开考。

1903年（癸卯），胡玉缙44岁，应经济特科考试。当时全国录取仅28人，其中一等9人，胡玉缙是9人中的第6名。顺便说一声，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，也是这一科录取，是第8名（9人的名次如下：袁嘉谷、张一麟、方履中、陶炯照、徐沅、胡玉缙、秦锡镇、俞陛云、袁励准）。该年，官湖北知县，入张之

洞幕府。

光绪甲辰（1904）东游日本考察学政，著有《甲辰东游日记》。丙午1906年，调任教育部主事，升为员外郎（从五品）。戊申1908年，被聘为礼学馆纂修。参与重修通礼之事。

1910年（宣统庚戌）二月，时50岁，京师大学堂成立，“以张文襄有言在先”，被聘为教员。讲授《周礼》，编撰《周礼学讲义》（见《周礼学自叙》，《许廑学林》240页）。其间，民国初年经学研究颇有成就的陈汉章为其学生。

可见胡玉缙在清朝末年，应是学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。并非“无名小卒”。因此，蔡元培才会器重他。否则，把一个国家初创的博物馆交给一个“无名小卒”，不免有点过于轻率了吧。

进入民国时期，他在博物馆筹备处时，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：如何处理当时存在其管辖之下的“满清内库大档”。

该档原存清宫内库，宣统末年，本拟销毁。经罗振玉等建言、努力，方得留存（参见罗振玉《集蓂编》即《雪堂自传》28—29页，载《罗雪堂全集》第五编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，1968—1977年）。

1913年历史博物馆接收上述档案。存于文庙敬一亭。所以管理这批档案，乃胡玉缙管辖下的份内之务。

关于民国初期这批档案的管理，曾在教育部任金事的鲁迅先生在1927年写的《而已集》中有所提及。鲁迅文中的锋芒，对当时的教育部的管理，负责人利用职权损公肥私的行为，颇加指责。考其文义，别有所指。对于胡玉缙，应该说还是笔下留情的，称他是“南菁书院的高材生，不但深究旧学，并且